

頭巾案（三）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2020 年 1 月 14 日 第二庭 裁定
- 2 BvR 1333/17 -
BVerfGE 153, 1-72

楊子慧 譯

要目

裁判要旨

案由

裁判主文

理由

- A. 事實
- B. 本件憲法訴訟部分合法
- C. 本件憲法訴訟無理由

關鍵詞

信仰自由（Glaubensfreiheit）

中立性（Neutralität）

職業訓練自由（Ausbildungsfreiheit）

裁判要旨

1. 當法律實習生從事被視為或可能被視為「代表國家」之活動，被課予「不得因遵循宗教上建構之著裝規則、對外展現其本人之隸屬某一宗教團體」義務時，即涉及干預受基本法第4條第1、2項所保障之個人信仰自由。
2. 國家的世界宗教觀的中立性原則、司法制度功能性原則，以及與第三人受基本權利上保護的消極信仰自由的可能衝突，為與信仰自

- 由對立之憲法法益，得正當化本案所涉信仰自由之干預而納入考量。反之，法官中立性的憲法要求及維護世界宗教觀和平相處的思想，則不具正當化系爭干預之效力。
3. 國家中立的義務不外乎是其公職人員的中立義務，因為國家僅能透過人而行為。然而並非國家的公職人員於執行公務之機會所為之任何私人基本權行使，均須歸於國家自己的行為。不過，當國家對某一公務行為的外在形象有特別之影響時，比如於司法領域，則尤可考量將該公務行為歸於國家自己的行為。
 4. 司法制度功能性屬於法治國的基本要件，且堅固地確立在基本法的價值體系中，因為司法權最終之目的係為維護基本權。司法制度功能性的前提要件在於，社會信任的不僅在於個別法官人格，而且是一體性的存在於司法中。縱然不可能在全體人民中贏得「絕對信任」，然而國家負有使之最優化的任務。
 5. 與反映宗教多元社會之信仰開放的非宗教學校不同，國家於司法領域係以傳統的高權形態對待人民，因此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6. 在法官勤務中使用宗教象徵本身並不足以引起對相關法官客觀性的懷疑。
 7. 於寬容誠命之考量下，憲法法益間規範緊張關係之調和，民主立法機關首先有責任在公共意志形成過程中找到對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在判斷是否為具有憲法位階規範的價值，以及是否足以要求所有宗教信仰的司法人員在使用宗教有關象徵時盡量克制之事實情狀與後續發展，立法機關享有評估特權。
 8. 鑒於系爭禁令的具體規定，相互衝突之法律地位之中並不存在迫使憲法上必須禁止或允許聲請人於法庭上佩戴宗教象徵的絕對優越性。因此從憲法的角度來看，立法機關對於要求法律實習生在世界觀和宗教方面保持中立的決定，是應當受到尊重的。

案 由

本案由E博士女士委託訴訟代理人就下列事項聲請憲法訴願：

1. 直接宣告黑森邦行政法院2017年5月23日1 B 1056/17判決違憲、
2. 間接宣告由黑森邦司法部2007年6月28日2220-V/A3-2007/6920-V

號文件所公布之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違憲，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在Voßkuhle院長、Huber法官、Hermanns法官、Müller法官、Kessel-Wulf法官、König法官、Maidowski法官、Langenfeld法官之審理下，於2020年1月14日作成裁定。

裁判主文

1. 本件憲法訴願駁回。
2. 退還費用之聲請駁回。

理 由

A. 事實

[1-73] 聲請人屬德國及摩洛哥國籍，於2017年在黑森邦擔任法律實習生，其認為在公共場合佩戴頭巾以作為個人信仰和個性的表現。於職業訓練開始前經由法蘭克福高等法院收到了一份通知單（Hinweisblatt），其上記載黑森邦司法部於2007年6月28日發布的命令，該命令規定戴頭巾的法律實習生在法庭審判中不得坐在法官席上，而只能在觀眾席旁聽，且包括不得主持庭審或進行證據調查、不得擔任檢察機關的會議代表、在行政實習期間不得主持聽證會，如無法完成某些職業訓練任務將對整體表現的評價產生負面影響。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2017年4月12日，法蘭克福行政法院作出裁判，命黑森邦確保聲請人在法律實習中可以全程佩戴頭巾，並且特別不受上開系爭命令限制。黑森邦政府提起上訴，黑森邦行政法院於2017年5月23日作出裁判，廢棄了前審裁判，並駁回了聲請人的請求，認為該法律實習生的頭巾禁令依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結合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1句，法律實習的執行方式涉及國家功能並代表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穿戴具宗教意義或象徵的服裝違反了司法權的中立義務。聲請人主張其依據基本法第12條第1項、第4條第1項和第2項、第2條第1項結合第1條第1項以及第3條第1項和第3項所享有的權利受到侵害，請求廢棄2017年5月23日黑森邦行政法院的裁判、2007年6月28日黑森邦司法部的命令，以及禁止其在法律準備服務中行使具外部效力的公權力行為時佩戴頭巾的命

令，並要求對其在憲法訴訟程序中產生的必要費用進行賠償。

B. 本件憲法訴訟部分合法

[74]就本憲法訴訟案間接針對黑森邦司法部於2007年6月28日發布的命令之部分程序不合法，不予受理。法院不受行政內部命令所約束，但須獨立判斷這些命令是否符合基本法和法律（參見BVerfGE 12, 180 <199>；78, 214 <227>）。而該命令非屬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5條第3項第2句所指得作為行政法院裁判所適用之依據，並且只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才能宣告其為無效的法律。

[75]在此之外，本憲法訴訟案程序合法，予以受理，特別在系爭命令影響的法律實習階段結束後，聲請人的權利保護必要依然存在。如果具有原則重要性的憲法問題無法以其他方式澄清，而且對系爭基本權利侵害特別嚴重時，權利保護必要尤其存在（參見BVerfGE 81, 138 <140>；99, 129 <138>；119, 309 <317>；139, 148 <171 Rn. 44>）。如同本案受到公權力行為的直接影響，被限制在一段時間內，在此當事人根據正常的業務過程（Geschäftsgang）幾乎無法獲得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裁決，情況尤其如此（參見BVerfGE 81, 138 <140 f.>；107, 299 <311>；110, 77 <85 f.>；117, 244 <268>；146, 294 <308 ff. Rn. 24>；149, 293 <316 Rn. 59>；stRspr）。否則，當事人的基本權利保障將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參見BVerfGE 34, 165 <180>；41, 29 <43>；49, 24 <51 f.>；81, 138 <141>；149, 293 <316 Rn. 59>）。

C. 本件憲法訴訟無理由

[76]本件憲法訴訟直接針對審查系爭黑森邦行政法院2017年5月23日的裁判，以及間接針對該裁判所適用黑森邦公務員法所定中立義務部分，無理由。系爭裁判係基於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和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所作出合憲性解釋。這一裁判既未侵害聲請人的宗教自由（I.），也未侵犯其受憲法保障之職業訓練自由（II.）或一般人格權（III.），並且也未因性別而遭受歧視（IV.）。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3句得為合於憲法之解釋，因此不需要將該規定宣告為違憲（V.）。

I.

[77]1. 聲請人在被視為或可能被視為國家代表的活動中，被課予

「不得透過遵循宗教上建構著裝規則、對外展現其本人之隸屬某一宗教團體」，且經行政法院確認之義務，已涉及干預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所保障的個人信仰自由。這使聲請人面臨兩難選擇：要麼從事她所追求的工作，要麼遵循她認為是必須遵守的宗教著裝規則。

[78] 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包含一個應全面性理解的統一基本權利（參見 BVerfGE 24, 236 <245 f.>；32, 98 <106>；44, 37 <49>；83, 341 <354>；108, 282 <297>；125, 39 <79>；stRspr）。這一權利不僅涵蓋信仰或不信仰的內在自由，即擁有信仰、隱瞞信仰、放棄先前的信仰或轉而信仰其他信仰的自由，也包括表達和傳播信仰的自由、為自己的信仰宣傳以及勸誘他人放棄其信仰的外在自由（參見 BVerfGE 12, 1 <4>；24, 236 <245>；105, 279 <294>；123, 148 <177>）。因此，這不僅包括宗教儀式行為和宗教習俗的實踐與遵循，還包括宗教教育及其他宗教和世界觀生活的表達形式（參見 BVerfGE 24, 236 <245 f.>；93, 1 <17>）。這也包括個人有權使其自身全部行為符合其信仰的教義，並據此一信念行事，即依其信仰生活；於此所涉及者，非僅止於強制性之信仰戒規（參見 BVerfGE 108, 282 <297>；138, 296 <328 f. Rn. 85>）。

[79] 聲請人另可援引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所賦予的作為公法上職業訓練關係中的法律實習生的基本權利。她的基本權利資格基本上不會因其融入國家任務範疇而受到影響（參見 für Beamte BVerfGE 108, 282 <297 f.> sowie für Angestellte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BVerfGE 138, 296 <328 Rn. 84>；另見 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58）。

[80] 在評估個案中何者可視為宗教和世界觀的實踐時，不可忽視有關宗教和世界觀團體及基本權利主體的自我認識（參見 BVerfGE 24, 236 <247 f.>；108, 282 <298 f.>；138, 296 <329 Rn. 86>）。基於信仰典型方式而繫頭巾的穆斯林女性，亦可在法律實習過程中援引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信仰和表達自由（Bekenntnisfreiheit）而請求保護。至於伊斯蘭教內部對所謂戴頭巾的要求事實上存在不同看法（例如請參閱 Wielandt, Die Vorschrift des Kopftuchtragens

für die muslimische Frau: Grundlagen und aktueller innerislamischer Diskussionsstand, 2009, abrufbar unter http://www.deutsche-islamkonferenz.de/SharedDocs/Anlagen/DIK/DE/Downloads/Sonstiges/Wielandt_Kopftuch.pdf <abgerufen am 14. Januar 2020> ; Şahin, Die Bedeutung des muslimischen Kopftuchs, 2014, S. 123 ff. ; Steinberg, Zwischen Grundgesetz und Scharia, 2018, S. 96-98 m.w.N.) , 則非關鍵，因為出於精神內涵和外觀表現之穿著選擇的宗教基礎是顯而易見（參見BVerfGE 108, 282 <298 f.> ; 138, 296 <330 Rn. 87 ff.> ; 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59）。

[81]2. 對於宗教自由的干預是合憲的。

[82] 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的限制必須源於憲法本身，因為此一基本權利並無法律保留之規定。這些憲法內在的限制包括第三人的基本權利以及具有憲法地位的共同體價值（參見BVerfGE 28, 243 <260 f.> ; 41, 29 <50 f.> ; 41, 88 <107> ; 44, 37 <49 f., 53> ; 52, 223 <247> ; 93, 1 <21> ; 108, 282 <297> ; 138, 296 <333 Rn. 98> ; 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61）。此外，對於此一基本權利之限制，還需有足夠明確的法律基礎（參見BVerfGE 108, 282 <297>）。

[83]a) 負責法律解釋首要任務之行政法院（參見BVerfGE 138, 296 <331 Rn. 91>），其形式上將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與公務員法第45條第1句和第2句視為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規範而予適用，並不存在憲法上的疑慮。

[84] 行政法院認為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中可以連結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即使該規定（按：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於參照規定公布之後始增定，這一理由符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此類動態參照的合法性所設定的標準（參見BVerfGE 26, 338 <365> ; 47, 285 <312> ; 141, 143 <176 f. Rn. 75> ; 參見 Dreier, in: Dreier, GG, Bd. 2, 3. Aufl. 2015, Art. 20 Rn. 118 m.w.N.）。

[85] 行政法院以憲法上無可指摘的方式，認為其所適用的法律依據足夠明確。依據聯邦憲法法院裁判，法律條文並不因其需要解釋

而欠缺必要之明確性（參見BVerfGE 45, 400 <420>；117, 71 <111>；128, 282 <317>；134, 141 <184 Rn. 127>；stRspr）。反之，如以傳統的法學方法得以解決法解釋問題，則滿足明確性要求（參見BVerfGE 17, 67 <82>；83, 130 <145>；127, 335 <356>；134, 141 <184 f. Rn. 127>）。法適用機關的主要任務是闡明疑點問題，並以法學方法的傳統方式解決法解釋問題（BVerfGE 134, 141 <185 Rn. 127> m.w.N）。這在本案看來並非顯然不可能。聲請人主張，根據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2句，不足以認定穆斯林頭巾「客觀上足以」損害對公務員中立職務行使的信任或危害宗教與思想的和平，就此以觀，聲請人並非主張該條文過於不明確，而是認為構成要件不該當。因此，其並非質疑法律依據的合憲性，而是法律適用的合憲性。

[86]b) 國家的世界宗教觀的中立性原則（aa）、司法制度功能性原則（bb），以及與第三人受基本權利上保護的消極信仰自由的可能衝突，為與信仰自由對立之憲法法益，得正當化本案所涉信仰自由之干預而納入考量（cc）。反之，法官中立性的憲法要求（dd）及維護世界宗教觀和平相處的思想（ee），則不具正當化系爭干預之效力。

[87]aa) 為了國家作為所有國民的家園，基本法以第4條第1項、第3條第3項第1句、第33條第3項規定，以及以基本法第140條連結威瑪憲法第136條第1項和第4項、第137條第1項，建立了國家對世界觀宗教保持中立的義務。基本法禁止引入國家教會的法律規範，並禁止給予特定信仰特權以及排斥信奉不同信仰之人（參見BVerfGE 19, 206 <216>；24, 236 <246>；33, 23 <28>；93, 1 <17>）。國家必須平等對待各種宗教和世界觀團體（參見BVerfGE 19, 1 <8>；19, 206 <216>；24, 236 <246>；93, 1 <17>；108, 282 <299 f.>；138, 296 <339 Rn. 109>），不得認同特定之宗教團體（參見BVerfGE 30, 415 <422>；93, 1 <17>；108, 282 <300>；138, 296 <339 Rn. 109>）。基本法中的自由國家，其特點在於包容多樣的世界觀和宗教信仰，並且奠基於以人的尊嚴和個體自由發展為核心的人的形象，強調自我決定和自我負責的價值觀。

[88] 不過，要求國家於世界觀宗教上保持中立，非指嚴格的政教分離，而是以一種開放的、包容的態度，平等促進所有信仰的宗教自

由。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也要求在世界觀宗教範圍內，確保信仰的積極實踐和個體自主實現的空間（參見BVerfGE 41, 29 <49>；93, 1 <16>）。國家僅不得為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或世界觀方向而施加任何有針對性的影響，或透過源自或可歸因於特定信仰或世界觀的措施，明示或暗示地認同該信仰或世界觀，進而危害社會的宗教和平（參閱BVerfGE 93, 1 <16 f.>；108, 282 <300>；138, 296 <339 Rn. 110>）。此外，世界觀宗教中立的原則也禁止國家對任何宗教團體的信仰和教義進行評價（參閱BVerfGE 33, 23 <29>；108, 282 <300>；137, 273 <305 Rn. 88>；138, 296 <339 Rn. 110>）。

[89] 國家之中立性義務與公務人員之中立性義務，並無不同（BVerfGE 138, 296, 359 <367 Rn. 14> abw. Meinung Hermanns/Schluckebier），因為國家只能透過自然人行事（參閱Volkman, Jura 2015, S. 1083 <1085>）。然而，國家不必將其公務人員在執行公務時行使私人基本權利視為自身行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兩審判庭都曾在女教師戴伊斯蘭教頭巾的問題上強調，國家接受與個別教師或教育工作者戴頭巾相關的宗教表達，但並不表示國家有意將此等宗教表達視為國家自身所為（so BVerfGE 138, 296 <336 f. Rn. 104>；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65 in Bezug auf den Eingriff in die negative Glaubensfreiheit der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vgl. ferner in Abgrenzung zu der staatlichen Anordnung, religiöse Symbole in der Schule anzubringen, BVerfGE 108, 282 <305 f.>）。儘管如此，兩審判庭均認為，教育工作者在學校和課堂中施行宗教相關事務，可能會影響國家在中立性下履行的教育任務（參見BVerfGE 108, 282 <303>；138, 296 <335 Rn. 103>）。因此，須依具體情況為判斷（vgl. Muckel, NVwZ 2017, S. 1132 <1132>）。

[90] 如果國家對公務行為的外在表現有特別的影響力，則個別公務員之異常行為方式即可能被視為國家自身之行為（參見Oebbecke, in: Germann/Muckel, Handbuch des Staatskirchenrechts, 3. Aufl., i.E., § 41 Rn. 25；zur Selbstdarstellung des Staates in diesem Zusammenhang ferner Eckertz-Höfer, DVBl 2018, S. 537 <544 f.>；

Häberle, DVBl 2018, S. 1263 <1266>）。此種情形亦發生於本案中。為了增強對法院中立性和公正性的信任，聯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不僅在各該訴訟法中詳細規定了言詞辯論期間程序。在此之外，攸關國家自我形象者，尚有課予法官穿著法袍的義務（參見 Schmidt-Räntsch, DRiG, 6. Aufl. 2009, § 46 Rn. 44 f. und Teil F；Häberle, DVBl 2018, S. 1263 <1266>；Runderlass des Hessischen Ministeriums der Justiz betreffend die Amtstracht bei den ordentlichen Gerichten, den Gerichten der allgemeinen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den Gerichten für Arbeitssachen, den Gerichten der Sozialgerichtsbarkeit und dem Hessischen Finanzgericht vom 7. Februar 2011 <JMBl 2012 S. 99>, neu in Kraft gesetzt durch Bekanntmachung des Hessischen Ministeriums der Justiz vom 28. Juni 2016 <JMBl S. 274>），以及一些傳統司法習慣，例如合議庭法官進入法庭的特別形式、在重要訴訟程序中的起立儀式，或法庭的設計等（allgemein dazu Vismann, Medien der Rechtsprechung, 2011, S. 146 ff.）。因此，區分出法院的正式情況與教學領域，前者明確定義個別公務員的外在表現，強調其距離感和統一性，後者則為公立學校中倡導的開放性和多元化（參見 BVerfGK 8, 151 <155>；Möllers, VVDStRL 68 <2008>, S. 47 <84>；Eckertz-Höfer, DVBl 2018, S. 537 <543>）。從客觀觀察者的角度來看，法官或檢察官在審理過程中戴伊斯蘭頭巾可能被視為國家侵害世界觀宗教中立性（參見 Schwabe, DVBl 2015, S. 570 <571>；Volkmann, Jura 2015, S. 1083 <1085>；Muckel, NVwZ 2017, S. 1132 <1132 f.>；Eckertz-Höfer, DVBl 2018, S. 537 <544>；Häberle, DVBl 2018, S. 1263 <1266>；a.A. Ladeur/Augsberg, JZ 2007, S. 12 <16>；Payandeh, DÖV 2018, S. 482 <486>；Sacksofsky, djBZ 2018, S. 8 <9>；Sinder, Der Staat 57 <2018>, S. 459 <466>）。考量相關公務員的基本權利，此種對世界觀宗教中立性之侵害是否須為公眾所接受，則有賴衡酌而決定（參見 unten C. I. 2. c；Jestaedt, Bitburger Gespräche 2017, S. 43 <58>；unklar zur Grundrechtsposition der Amtsträgerin Dreier, Staat ohne Gott, 2018, S. 135 f.）。

[91]bb) 在此須考量法治國的基本條件之一——司法制度功能

性，即作為宗教自由的另一個憲法內在限制，在基本法的價值體系中（基本法第19條第4項、第20條第3項、第92條）有著堅實的根基（參見BVerfGE 34, 238 <248 f.>；77, 65 <76>；80, 367 <375>；106, 28 <49>；107, 104 <118>；113, 29 <54>；117, 163 <186 f.>；118, 1 <17>；122, 190 <207>；135, 90 <115 Rn. 65>；141, 82 <90 Rn. 24>；141, 121 <134 f. Rn. 44>；allgemein zur „Funktionsfähigkeit“ als Grundrechtsschranke Lerche, BayVBl 1991, S. 517 ff.；Kriele, in: Isensee/Kirchhof, HStR IX, 3. Aufl. 2011, § 188 Rn. 94 ff. m.w.N.），因為所有的司法裁判最終都是為了保護基本權利（參見BVerfGE 33, 23 <32>）。發揮司法救濟功能性的前提是，社會不僅對法官個人有信心，對整個司法體制也有信心（參見Weidemann, ZJS 2016, S. 286 <294>；Eckertz-Höfer, DVBl 2018, S. 537 <543>；Friedrich, KuR 2018, S. 88 <101 f.>）。無論具體爭議案件如何，這種信任都是必須的，並且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或加強。雖然要達到全民的「絕對信任」是不可實現的，但國家在這方面應負優化任務。如前所述，國家目前正通過嚴格的形式化規定來追求這一目標。

[92]在選擇應採取的改善措施時，國家有一定的判斷餘地。特別是在加強民眾對司法接受度的目標上，必須確定其接受度不足係基於客觀可理解的情況。法院判決並因此實行基於基本法價值觀的任務，意味著司法機構及其裁判有時必須承受部分社會人士的抵制。相對而言，國家可以採取措施，從客觀第三人的角度來強調司法中立性。如國家及其公務員禁止宗教表達或使用宗教象徵的命令，在法庭上平等適用於所有表達和象徵（參見BVerfGE 108, 282 <313>；138, 296 <346 ff. Rn. 123 ff.>），則可被視為這一概念的合法表現（參見Jestaedt, Bitburger Gespräche 2017, S. 43 <52>）。雖然個別公務員的宗教信仰本身並不妨礙他們的專業職責（參見unten C. I. 2. b) dd），但個別法官在履行職務時與個人的宗教、世界觀和政治信仰明顯的保持距離，有助於增加公眾對司法中立性的信任。反之，公開表達宗教信仰則可能損害整體司法形象，這一形象正是由那些應作成決定的公務員特別的個人克制所塑造的。

[93]cc) 訴訟當事人的消極宗教自由亦支持在目前情況下禁止頭

中的合理性。

[94] 依據基本法第4條第1項和第2項，參加宗教儀式的權利受到保障，不參與某一信仰宗教儀式的自由亦同，此同樣適用於使用宗教或信仰的象徵。基本法第4條第1項允許個人決定認可和崇敬哪些宗教象徵，以及拒絕哪些象徵。然而，在一個容納不同信仰的社會中，個人並無不受他人信仰表達、宗教儀式和宗教象徵影響之權利。應與此相區別者，為由國家所創造之以下情境，即個人處於受到特定信仰的影響，被置於該信仰的表現行為及其代表象徵之下，又沒有任何迴避之可能性（參見 BVerfGE 93, 1 <15 f.>；108, 282 <301 f.>；138, 296 <336 Rn. 104>；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64）。

[95] 如果國家不禁止使用宗教象徵，在法庭空間中呈現出前述意義上的宗教象徵將是不可避免的。這可能對個別訴訟當事人造成一種負擔，等同於對其基本權利的干預（另見 auch BayVerfGH, Entscheidung vom 14. März 2019 - Vf. 3-VII-18 -, juris, Rn. 27 f.）。與反映宗教多元社會之信仰開放的非宗教學校不同（參見 BVerfGE 138, 296 <337 Rn. 105>），國家在司法機關以傳統的權威方式面對人民，因此對其影響更大（參見 Steinberg, Der Staat 56 <2017>, S. 157 <174>；Wolf, RuP 2017, S. 66；Häberle, Der Staat 57 <2018>, S. 35 <56>；a.A. Muckel, NVwZ 2017, S. 1132 <1133>；Samour, djbZ 2018, S. 12 <13>；Sinder, Der Staat 57 <2018>, S. 459 <465>）。宗教象徵的使用（如戴頭巾之情形）是基於代表國家行為的公務員的私人決定時，亦然。只有國家能防止頭巾在法庭上作為宗教象徵所引發的不可避免的衝突（參見 Röhrig, Religiöse Symbole in staatlichen Einrichtungen als Grundrechtseingriffe, 2017, S. 205 ff. unter Hinweis auf die staatliche Schutzpflicht）。

[96]dd) 從基本法第20條第2項第2句和第20條第3項，以及第92條、第97條和第101條第1項第2句等規定，可導出法官公正性原則。任何人不得就自己案件中擔任法官的原則，是法治國的重要基本原則。由不參與案件的第三方來處理，乃法官行為之本質；這便要求法官須對所有訴訟當事人保持中立和距離。基本法第101條第1

項第2句保障個人在具體案件中所面對的是符合這些要求的法官（參見 BVerfGE 3, 377 <381>；4, 331 <346>；14, 56 <69>；21, 139 <145 f.>；82, 286 <298>；89, 28 <36>；148, 69 <96 Rn. 69>）。兼有確保公正性之法官獨立性的保護，涉及的是法官一般性的立場和活動，旨在防止法官受到來自外部與法律或事物無關的影響；相對於此，法官之公正性，則是著眼於具體訴訟中法官與當事人及訴訟標的之間的關係，確保法官客觀性與合事理性的前提條件（BVerfGE 148, 69 <96 f. Rn. 69>）。

[97] 這一標準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及歐洲人權法院的相關判例（參見 BVerfGE 148, 69 <97 Rn. 71>）。根據該公約第6條第1項的定義，公正性係指無偏見和黨派性。此須從主觀角度進行審查，評估法官的個人信念和行為；同時，還需要考慮客觀因素，調查是否存在影響公正性之結構性或功能性原因。其關鍵在於，法院的組成是否提供足夠的保證，以排除對其公正性的任何合理懷疑（BVerfGE 148, 69 <98 f. Rn. 74>；vgl. EGMR, Fey v. Austria, Urteil vom 24. Februar 1993, Nr. 14396/88, Rn. 27 ff.；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Urteil vom 10. Juni 1996, Nr. 22399/93, Rn. 30；Morel v. France, Urteil vom 6. Juni 2000, Nr. 34130/96, Rn. 40 ff.；Wettstein v. Switzerland, Urteil vom 21. Dezember 2000, Nr. 33958/96, Rn. 42；EGMR <GK>, Micallef v. Malta, Urteil vom 15. Oktober 2009, Nr. 17056/06, Rn. 93；EGMR, Oleksandr Volkov v. Ukraine, Urteil vom 9. Januar 2013, Nr. 21722/11, Rn. 104）。

[98] 立法機關有責任制定程序法則，確保在具體案件中負責判決的法官中立性，以及（與特定事物）保持距離（參見 BVerfGE 21, 139 <146>；30, 149 <153>；148, 69 <97 Rn. 70>）。訴訟法中有關因法官有偏頗之虞而排除法官及其迴避規定，旨在實現此一目標。於前述情況，只要有缺乏客觀性的「惡性外觀」即為已足，即法官於對外執行職務時，此種外觀即損及法官角色的可信任性（參見 BVerfGE 20, 1 <5>；82, 30 <38>；stRspr）。在民主社會中，唯有獲當事人及公眾信任的法官，方能履行其解決衝突的任務及隨之而來的維持和平的功能（參見 BVerfGE 148, 69 <97 Rn. 70, 99 Rn. 75>；„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vgl. EGMR, *Delcourt v. Belgium*, Urteil vom 17. Januar 1970, Nr. 2689/65, Rn. 31 ; *Oleksandr Volkov v. Ukraine*, Urteil vom 9. Januar 2013, Nr. 21722/11, Rn. 106, der Sache nach jeweils aufgreifend High Court of Justice,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cCarthy*, [1924] 1 KB 256)。

[99]在法官職務中使用宗教象徵本身尚不足以引起對法官客觀性的懷疑（參見 Wißmann, DRiZ 2016, S. 224 <226> ; Rath, RuP 2017, S. 67 ; Payandeh, DÖV 2018, S. 482 <486> ; Sacksofsky, djbZ 2018, S. 8 <9> ; Sinder, *Der Staat* 57 <2018>, S. 459 <469>）。正如法官屬於某一政黨也不會引起對其偏見的疑慮（參見 BVerfGE 2, 295 <297> ; 11, 1 <3> ; 43, 126 <128>），對於其宗教或信仰的背景也是如此（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3. Juli 2013 - 1 BvR 782/12 -, Rn. 6）。經遴選而擔任法官職務者忠於法律之態度是受到期待的，無關法官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或政治立場為何（參見 Wiese, *Lehrerinnen mit Kopftuch*, 2008, S. 306 ; Berghahn, KJ 2018, S. 167 <176> ; Eckertz-Höfer, DVBl 2018, S. 537 <541>）。法官在遴選程序及先前的培訓中，原則上已被證明其具備公正處理法律案件之能力。因此，沒有理由否認那些允許透過使用象徵向第三方公開展示其宗教觀點的人的能力。如果個人在職務上無法滿足這一基本要求，法官服務法中設有終止聘用法官機制，可供運用，特別是在試用期內（參見德國法官法第22條）。在具體案件中，訴訟當事人的宗教信仰具有決定性意義——如在難民庇護理由的認可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則法官席上的宗教象徵可能在個案引發偏見的疑慮。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法官迴避制度可以保障尋求法律救濟者擁有客觀法官的權利（參見 Payandeh, DÖV 2018, S. 482 <487> ; Sinder, *Der Staat* 57 <2018>, S. 459 <476>）。

[100]ee) 根據世界觀宗教中立原則，國家不得意圖引導朝向某一特定的世界觀方向，也不得與特定信仰或世界觀產生認同，以危害社會中的宗教和平（參見 BVerfGE 93, 1 <16 f.> ; 108, 282 <300> ; 138, 296 <339 Rn. 110>）。然而，中立義務無法推導出一個獨立於國家行為之外的、對社會宗教和平的一般性保護請求權，這種要求並不

是一項涵蓋所有生活領域的保證人責任（參見Sacksofsky, DVBl 2015, S. 801 <806>）。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不包含如此廣泛的義務。僅涉及憲法內在法益的情況下，防制第三人所為對世界觀和宗教和平之干擾的國家保護義務才會被納入考量。例如，根據基本法第7條第1項所確立的國家教育任務，國家有責任維護學校在世界觀和宗教方面的和平（參見BVerfGE 108, 282 <303>；138, 296 <333 f. Rn. 99, 335 f. Rn. 103, 338 Rn. 108>；BVerwGE 141, 223 <235 ff. Rn. 41 ff.>；參見Staatsgerichtshof des Landes Hessen, Urteil vom 10. Dezember 2007 - P.St. 2016 -, juris, Rn. 96）。然而，於司法領域沒有類似的規定。因此，如果個人只是受到或可能受到宗教表現的干擾，並無充分理由禁止在法庭上表達宗教信仰。

[101]c) 首先，民主的立法機關有責任在考慮到容忍原則之下解決憲法法益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公開之意志形成過程中找到對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於此須一併考量相關的基本法條款，其解釋和適用範圍應相互協調（參見BVerfGE 108, 282 <302 f.>；138, 296 <333 Rn. 98>）。然而，國家必須在宗教與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與干預的嚴重性之間，一方面保持適當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干預正當化理由的份量，尤其是在基本上是預防性地禁止外部宗教表現的情況（參見BVerfGE 83, 1 <19>；90, 145 <173>；102, 197 <220>；104, 337 <349>；138, 296 <335 Rn. 102>；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62）。相關的公務員信仰自由在此具有重要價值，特別是因為與人性尊嚴密切相關，是基本權利體系中的最高價值，須予以廣泛解釋（參見BVerfGE 24, 236 <246>；35, 366 <375 f.>）。因此，立法決定的可支持性必須接受嚴格的司法審查（參見BVerfGE 45, 187 <238>）。然而，立法機關在評估是否為具有憲法價值的規範，即是否足以要求所有宗教信仰的司法人員在使用宗教有關象徵時盡量克制，其仍然享有評估的特權（參見BVerfGE 108, 282 <310 f.>；138, 296 <335 Rn. 102>）。

[102] 基於上述考量，系爭行政法院裁判及其所適用的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連結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的解釋，在

憲法上並無不當之處。鑒於系爭禁令的具體規定，相關相衝突之權利地位之間並不存在憲法上必須禁止或允許聲請人於法庭上佩戴宗教象徵的絕對優越性。因此從憲法的角度來看，立法機關對於要求法律實習生在世界觀和宗教方面保持中立的決定，是應當受到尊重的（參見 Volkman, Jura 2015, S. 1083 <1087, 1090>；Heinig, RdJB 2015, S. 217 <229>；Tomuschat, EuGRZ 2016, S. 6 <10>；Reus/Mühlhausen, VR 2019, S. 73 <79>）。

[103]aa) 有利於聲請人權利地位的情形是，對她而言，戴頭巾不僅僅是屬於某一特定宗教群體的標誌，一種——如項鍊上的十字架——可以隨時摘下的標誌（參見 Sinder, ZevKR 63 <2018>, S. 170 <203>），而是代表著遵循一項被視為具有拘束力的責任，這在基督教中並不存在相應的、如此廣泛的對等形式。因此，宗教表達的一般禁令對聲請人的影響比對其他宗教信仰者，特別是基督教的公務員要更為嚴重（參見 Berghahn, KJ 2018, S. 167 <175>）。此外，公務員和法官通常是在了解現行規範的情況下，有意識地自願決定在公共部門工作。然而，尋求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的法律專業人士，只能通過完成法律實習來達成此目標，別無他途。

[104]bb) 反之，系爭規定僅禁止國家優先考量具憲法中立性要求的少數個別活動，此一情形則有利於認定系爭禁令之合憲性（參見 Reus/Mühlhausen, VR 2019, S. 73 <81>）。此點主要適用於被賦予司法職責的法律實習生、檢察官，以及在行政實習期間擔任類似司法的職責，例如主持聽證會等。在這方面，他們和檢察官或一般行政的公務員一樣，必須體現憲法所賦予司法的價值。法律實習生只是處於培訓階段，其完成培訓後可能從事不受上述憲法標準約束的活動，此點並不會導致不同的評價。對於尋求權利救濟或受法律規範的人來說，法律實習生的活動一方面並不總是可以被認知到；在另一方面，尋求權利救濟或受法律規範的人有權要求，國家基於培訓目的而將上述任務交給法律實習生處理時，仍應同等適用司法之基本條件。

[105] 這些活動所涵蓋的職業訓練期間相對較短。儘管職業訓練規定對這些活動賦予高度重視（參見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2 句，該條規定法律實習生應盡可能獨立並根據活動的性質承擔

實際任務），卻沒有完成這些活動的法律上請求權。尤其是檢察官的庭審，在實際慣例上，這可能是法律實習生最常負責的對外活動，卻在相關的職業訓練計畫中並未被明確稱為「狹義的常規工作」，因為這通常無法接受導師的具體評估（Zweiter Teil, Abschnitt III des Runderlasses des Hessischen Ministeriums der Justiz vom 21. Oktober 2014 - 2220-II/E2-2014/7709-II/E -, JMBl S. 703）。最終，根據修訂後的命令，不提交計畫中常規工作不應影響對聲請人的評價。因此，聲請人能夠完成一個全面的法律實習。

[106] 在上述背景下，行政法院基於對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與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的合憲適用作成裁判。

II.

[107] 聲請人依基本法第12條第1項所保障的職業訓練自由也未受到侵害。

[108] 基本法第12條第1項第1句保障所有德國人有權自由選擇職業訓練機構。這與職業選擇自由密切相關，因為職業訓練通常是從事職業的初階，兩者構成一個整體生活過程的組成部分（參見 BVerfGE 33, 303 <329 f.>；134, 1 <13 f. Rn. 37>）。如果某一職業——如執業律師（BVerfGE 33, 303 <329 f.>；134, 1 <13 f. Rn. 37>）。Wenn die Aufnahme eines Berufs-wie bei Volljuristen (vgl. § 5 Abs. 1, § 9 Nr. 3, § 122 Abs. 1 DRiG, § 4 Satz 1 Nr. 1 der Bundesrechtsanwaltsordnung <BRAO>)——需要特定的職業訓練，如不被允許參加此訓練，代表未來無法從事該職業（參見 BVerfGE 33, 303 <330>；147, 253 <306 Rn. 104>）。

[109] 除了本案未論及之自由選擇職業訓練機構之權利外，基本法第12條第1項亦保障在職業訓練過程中必要的活動（參見 allgemein: BVerfGE 33, 303 <329>；in Bezug auf die Teilnahme an Prüfungen während der Ausbildung: BVerfGE 84, 34 <45>；84, 59 <72>）。當然也包括在法院、檢察署和行政機關承擔的職責。如前所述，雖然在法律實習中無需實際承擔這類任務，但相關的職業訓練規定表明，立法機關認為這類活動至少是定期所需的職業訓練內容。

[110] 針對聲請人執行上述公務時戴頭巾所作出的禁令，也在行

政法院的緊急程序中得到確認，而干預了職業訓練自由所保障的內容。然而，相較於不受限制的宗教自由，職業訓練自由並不能受有更多的保障。即使在個別情況下，一項被視為強制性的宗教命令涉及到職業選擇的自由（基本法第12條第1項），邦立法機關所追求的宗教與世界觀的中立性、司法制度功能性以及保護第三人的消極宗教自由等特別重要的社會利益，仍足以正當化該規定（參見BVerfGE 119, 59 <83>；138, 296 <353 Rn. 141>）。

III.

[111] 戴頭巾是聲請人個人認同的一種表現，而作為一般人格權的一部分，受到基本法第2條第1項與第1條第1項的保護（參見BVerfGE 138, 296 <332 Rn. 96>；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Oktober 2016 - 1 BvR 354/11 -, Rn. 60）。一般人格權在這一保障下，尤其保護個人生活和性格的自我決定權（Di Fabio, in: Maunz/Dürig, GG, Art. 2 Abs. 1 Rn. 166 <2001年7月>；參見Dreier, in: Dreier, GG, Bd. 1, 3. Aufl. 2013, Art. 2 Abs. 1 Rn. 72；Jarass, in: Jarass/Pieroth, GG, 15. Aufl. 2018, Art. 2 Rn. 40）。個人應有權決定自己如何向他人或公眾展示自己，以及什麼構成其社會地位的標誌（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3. November 1999 - 2 BvR 2039/99 -, Rn. 15；vgl. BVerfGE 35, 202 <220>；54, 148 <155 f.>；63, 131 <142>；Samour, djbZ 2018, S. 12 <13>）。

[112] 然基於前述理由，本案所涉及之對一般人格權的干預乃具有正當性。

IV.

[113] 法律人養成教育法第27條第1項第2句和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的中立性要求是否會導致聲請人的性別受到間接歧視（基本法第3條第2項第1句及第3項第1句）於此無需作出判斷。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2句禁止穿著某些服裝，尤其具有宗教含義的服裝，事實上主要會影響那些因宗教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參見BVerfGE 138, 296 <354 Rn. 143>）。然而該規定僅作為同條第1句的具體化，後者同樣規定所有公務員有保持政治、世界觀和宗教上的中立的義務，因

此中立性要求並不僅限於穿著特定服裝。目前生效的黑森邦司法部於2017年7月24日發布的命令（2220-II/E2-2017/7064-II/E）與2007年6月28日的命令（2220-V/A3-2007/6920-V）不同，未明確提及頭巾，而是規定行為中立的一般性義務。如果將該規範視為具有間接歧視效果，則同樣須以干預基本法第4條的理由來證明（參見BVerfGE 138, 296 <354 Rn. 145>）。

V.

[114] 儘管行政法院的裁判沒有明確適用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3句，但與同條第1句和第2句緊密相關（參見BVerfGE 138, 296 <346 Rn. 123> in Bezug auf den dort zur Prüfung gestellten § 57 Abs. 4 Satz 3 SchulG NW），並且受到聲請人明確的指摘，只要其適用符合憲法，就與基本法的規定相一致。

[115] 根據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3句，對於在判斷是否符合同條第1句和第2句條件時，必須適當考慮具有基督教和人文主義色彩的西方傳統，即在具體案例中行為是否符合該規範的中立要求。該條款的適用可能會導致對基督教公務員的優待，是不符合憲法的（1.）。但對於該條款的作合憲之限制性解釋是可能的（2.）。

[116] 1. 基本法第3條第3項第1句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其信仰或宗教觀念而受到歧視或優待。該規範強化了第3條第1項的平等原則及第4條第1項和第2項所保障的宗教自由（BVerfGE 138, 296 <347 Rn. 125>）。如果對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3項的理解，完全排除基督教象徵於中立原則的適用範圍，則與前述不符（參見BVerfGE 138, 296 <348 Rn. 127, 371 Rn. 21>）。如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學校法第57條第4項第3句規定「基督教和西方教育及文化價值或傳統的表現[……]不違反行為準則」。

[117] 2. 黑森邦公務員法第45條第3項不包含如此明確的排除條款（參見Staatsgerichtshof des Landes Hessen, Urteil vom 10. Dezember 2007 - P.St. 2016 -, juris, Rn. 120；Eckertz-Höfer, DVBl 2018, S. 537 <542>）。相反的，黑森邦的基督教和人文主義色彩的西方傳統是判斷是否違反中立時必須考慮的因素。該規範並不免除國家審查（基督教）的表現是否能在個別案件中與世界觀宗教中立的原則相協調。這

在憲法上必要的情況下，開啟了平等對待對不同宗教背景——如司法領域上——的可能性。至於在某些國家領域內不同處理方式是否正當，於本案無需進一步澄清。

[118] 這種解釋方式尚符合解釋的界限（參見 BVerfGE 138, 296 <350 Rn. 132> m.w.N.），因其合於文義解釋，且無違法立法者意旨。立法者可能認為得予以基督教表現形式的特權，但具體允許的象徵決定交由行政機關依個案判斷，並表明禁止基督教象徵是允許的（參見 LTDrucks 16/1897 新，S. 4）。

D.

[119] 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4a 條第 3 項規定裁決費用，駁回憲法訴訟案，無理由退還聲請人費用。

E.

[120] 本裁定以 7 比 1 的票數通過。

法官：

Voßkuhle

Huber

Hermanns

Müller

Kessal-Wulf

König

Maidowski

Langenfeld

